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查晓英
编

常乃惠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查晓英
编

常乃惠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常乃惠卷/查晓英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300-19212-3

I. ①中… II. ①查…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常乃惠 (1898~1947)-思想评论 IV. ①B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6054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常乃惠卷

查晓英 编

Chang Naide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7.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6 000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言：为渐进变革寻找历史法则

如果说史学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那么当许多曾经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史家的著述中时，人们的自我认识一定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故纸堆里发掘出的人和事，与当下思想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克武研究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便很强调最近数十年史学风向与政治社会情绪的同步。^① 不过，尽管常乃惠这个“被遗忘的思想家”^② 重现于报章杂志，却仍然被视为“思想史上薄薄的一页”。^③ 他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阐释，与人们的“自我认识”似乎尚有一段距离。

常乃惠（1898—1947）^④ 出生于山西榆次的晋商家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多所中学、大学任教。加入中国青年党后长期主持该党宣传工作，在舆论界独树一帜。他自诩为“百科全书派”，声称自己既不图为学问家，也不妄想成就事功，只愿做个想说就说想做就做的痛快人。^⑤ 事实上，常乃惠一生都企图在行动与思想、政治与学

① 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9～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② 例如智效民的一篇文章就以“被遗忘的思想家——常燕生”为题，见《博览群书》1998年第12期。

③ 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惠和〈中国思想小史〉》，《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④ 常乃惠本人署名多样，除了笔名和字外，姓名亦有几种写法：“常乃惠”、“常乃惠”、“常乃德”，本文正文采用第二种。若其他引文出处有不同署名，则用引文的署名。

⑤ 参见常乃惠：《〈常言道〉发刊辞》，《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黄欣周编，34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术之间纵横捭阖。^① 他是一个重视行动的学者，并不幻想从意识层面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党派竞争、亡国危机以及著述特长最终促使他强调“思想”问题，直接导致他最为人称道的“生物史观”理论的诞生。

因为重视行动，常乃惠倾向于渐进改良的办法，以图行动都能获致一定的效果；因为重视思想，他又吸取了阶段论的结构，建立了一套历史法则，以图思想能够真正影响到青年。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结合，恰好反映出现代中国在传统思想资源与西方思想资源之间、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之间存在着多种样式的关联。作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常乃惠也曾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②，唯其思想与行动之间体现的时代精神尚未彰显，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仍有待发覆。

一、五四前后：现象与理想的拉锯

常乃惠自小受传统书本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基层官吏，或许这两方面都对青年时期的常乃惠产生了影响，使他在相信神鬼、主张精神文明的同时，并未陷溺于消极无为或偏重意识改造的态度中。他认可“革命”^③，并且接受了支持革命理论的进化思想。但他同时有一股少年老成之气，主张以稳妥办法推动社会改变，以同情心理看待传统。

① 常乃惠的生平事迹参见本书《常乃惠年谱简编》。

② 吴天堦：《心波》，《常燕生先生遗集（八）·哀挽录》，43～53页；黄欣周：《常乃惠》，《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中华学术院编，567～583页，台北，华冈出版部，1973；许冠三：《常乃惠：生物法则支配一切》，《新史学九十年》，332～35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黄敏兰：《一个严谨的史学理论体系——常乃惠史学理论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张学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张少鹏：《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放光旭：《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常崇宇：《大陆中国青年党人的归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朱慈恩：《常乃惠历史哲学述论》，《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张炜、郭方：《以国家主义为中心构建的历史体系——常乃惠世界史研究成就探析》，《史林》2008年第3期；蒋正虎：《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常乃惠对进化论的继受与重新解读》，《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彩丹、郑伟：《常乃惠与新文化运动》，《北大史学》（16），北京大学历史系编，128～1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顾友谷：《常乃惠的史学观》，《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

③ “革命”一词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比较宽泛的意义和广泛支持，见罗志田：《土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104～1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当常乃惠在1916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不久，便针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倒孔论发表不同意见。^① 他赞成废文言与反尊孔，但否认文言中的一切与孔子的一切都一无是处。在他看来，“走极端”的言论^②不会带来恰到好处的结果，不合时宜的理想可能产生“众人为暴”的结局。他把民国建立后层出不穷的乱相归罪于专制的存在，认为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本质上都是专制，既然如此，为何不舍乱而取治呢？^③

陈独秀承认“专制余波”酿成了共和之乱，但将其归因于人们对共和宪政“无信仰、无决心”。他坚信自己对“共和”的追求是转移世风的“百年大计”，并规劝常乃惠：“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④ 常乃惠回应道，“人生于世，不可无理想之鹄的以为进行标准”，但“所谓不经破坏，不能建设一语”却不妥当。他建议陈独秀转向提倡积极、建设的言论。^⑤

常乃惠对于具体的文学问题、孔子问题都有独立清晰的见解，却无法不对陈独秀的高远理想表示敬意。尽管在事实上，常乃惠对陈独秀所说的理想仅具一种“遥远的”同情，在他的社会改造观里那种理想不起任何直接作用。^⑥ 但在随后数年中，常乃惠的言论却深受“理想”的影响。

民国初年，吴贯因曾经说，读书与治事，一偏重于理想，一偏重于经验，理想与经验常不一致，故学者、政治家因而分途。但是他接着指出，当社会日臻于文明，理论与事实即日趋于一致，学者与政治家将逐渐合一。并且政治事业常需运用科学，政界已渐成学者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呼吁“天下读书人”要以政界为用武之地。^⑦ 一位署名“漆室”的

① 争论的内容收入陈独秀：《独秀文存》，642～68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8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③ 参见常乃惠：《附常乃惠书》，《独秀文存》，650～654页。

④ 陈独秀：《再答常乃惠》，《独秀文存》，649～650页。

⑤ 参见常乃惠：《附常乃惠书》，《独秀文存》，666～667页。

⑥ 例如关于道德改造问题的讨论，陈独秀与常乃惠各执利他与自利两说，见常乃惠：《纪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565～566页。又如关于应否爱国的问题，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60～67页；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431～432页；常乃惠：《爱国——为什么？》，《国民》第2卷第1号，1919。

⑦ 吴贯因：《学者与政治家》，《庸言》第1卷第5号，1913。“理想”与“理论”两词在他的文章中是混用的。

作者，也把民初“思想界的悲凉落寞”归罪于“与理想分离之计划”。事事以眼前利益为打算，导致“塞断国民高洁之观念，凿尽国民美善之根苗”^①。而在常乃惠的眼中，民初的《甲寅》杂志首先就是因为“在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引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②

常乃惠认为，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期，理应向着第三期西方文明改进，后者已有的缺陷，将在第四期文明中改进。^③常乃惠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个阶段的演变，人在其中的作用就是适应和促进，无法僭越。如果现存最“先进”的社会仍有不足，再往前的社会状态便要靠人们的理想与创造了。这是他评论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的发展时，明显遵循的思路。^④既然第四期文明一定会到来，人们对它进行设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时常乃惠承认，唯物史观虽然受到过许多驳难，其价值却终不可磨灭。按照教育与其他社会制度均决定于经济制度这一规律，理想的教育将同理想的社会一起，随着经济发达而最终出现，这种带大同色彩的教育制度被他称为“全民教育”。^⑤不过他理解的作为决定因素的“经济”是偏重在生产技术层面的，即“生产和运输的技术的演进，可以决定经济情形，及其他社会各种制度的演进”。因为生产与运输技术发达，全世界将缩为咫尺，“人和人可以不出家门，而得到聚合的机会”。于是未来教育的趋势首先是“以社会教育，代学校教育”。^⑥社会组织的变化将促成这一趋势。常乃惠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大工业生产方法底下必然的制度。我们的资本集中的情形，引起阶级不平的呼声，是人人所知的。但这种资本集中的将来究竟伊于胡底，却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社会主义的祖师马克思曾告我们这种资本集中的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国的出现。我相信他的话是不错的”^⑦。

① 漆室：《思想界销沉之两大原因》，《雅言》第1卷第7期，1914。

② 参见常乃惠：《中国思想小史》，《常燕生先生遗集补编》，180页。

③ 参见常乃惠：《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文选》，陈崧编，281～2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④ 参见常乃惠：《北京与上海》，《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10页。

⑤ 舒新城称之为“大同教育思想”，见氏著《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教育通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⑥ 参见常乃惠：《毁校造校论》，《全民教育论发凡》，183～218页。

⑦ 常乃惠：《全民教育论发凡》，《全民教育论发凡》，116～1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尽管如此，常乃惠并不信任“阶级斗争”的办法。在他看来，即使人们不“有意的努力”，这一理想社会同教育制度终将逐渐达到，因为大工业制度必将发展，生产和交通方法也将随之演进，教育制度必然会变化。人为手段乃是这一自然演进过程的辅助，包括促进科学发明、进行社会改造^①、改良都市、改良乡村等等。^②

但有时他会表现得更激进一些，例如在组建“教育改造社”期间，他就提出：“要达到未来的新理想，必须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将这种旧的教育制度全部推翻，然后再重新创造适合于发展新理想的教育制度。在旧教育制度未曾根本推翻以前，不但新的理想无从实现，即新的制度也无从单独建设起。”人的努力在他的论述中作用变得更大了，是可以保证“天然的进化”“不走错方向”的必要手段。因此，“教育的革命”或者“革命的教育”首先应做的，就是完全摧毁现存和学校制度。^③

在常乃惠构想未来教育制度的同时，他对现实中的学术独立与学潮问题，也提出了现实的解决办法。例如，鼓吹政府和资本家投资，帮办学术独立^④；学生无权干涉学校的规定、教师需多多地容纳学生的意见，互相让步以解决学潮。^⑤

即使在与“共产主义”最亲近的这段时期，常乃惠也警惕地关注着理想的边界。他批评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中，报纸言论里“‘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远远压倒了发起者的清晰觉悟。名为“维持科学”，实际上却杂以“拥护资本家”、“实行侵略”等等与“科学”本无关系的内容。^⑥在他看来，“思想界一般的标准太低，浮浅的议论到处被恭维为湛深的学理”，于是脑筋混乱的人以为科学文艺的内容不过如此，更随便地著书立说，稍知自爱的人更否认一切思想。^⑦贬低所谓

① 常乃惠对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讲得很简略，尽管提出全民政治制度、全民经济制度，但总体上是属于辅助性的。而且他认为俄国、中国这样的工业幼稚的国家只可能产生出“伪的社会主义国”，非得等到工业十分发达，真正的社会主义才会出现。

② 参见常乃惠：《全民教育论发凡》，《全民教育论发凡》，116～125页。

③ 参见常乃惠：《毁校造校论》，《全民教育论发凡》，183～218页。

④ 常乃德：《通讯》，《教育杂志》14卷第6期，1922。

⑤ 参见常乃惠：《学校性质之研究》，《全民教育论发凡》，182页。

⑥ 参见常乃德：《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真光》21卷第10、11期，1922。此文为常乃德与一友人共同撰写，以常名发表。原刊于1922年4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为《真光》杂志编者转载。

⑦ 参见常乃惠：《虚无主义与中国青年》，《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23页。

“思想”的意义，重视实际行动的重要性，这个倾向导致他在五四后反对胡适“不谈政治”的主张。他把“不谈政治”视为“中国人漠视现实精神的一种表现”，“是几千年专制政体下养成的结果，与西方人的民治精神相去不啻天渊”，反映多数中国人仍未能彻底了解西洋文化的真面目，这是“新思潮”的失败。^①因此，他向胡适建议：现在“应当转过来从思想文艺鼓吹到政治”。^②这个政治，是重视现实精神的政治。

当《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最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常乃惠的主张已经彻底转变到“国家主义”上了。他在后序里说：“我们现在谈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为期尚远。我们非先有机枪对打的精神和实力我们便不配主张什么理想，便主张出来也无人瞧得起。因此提倡国家主义以保全种族，乃是目前极需要的事情。”对于书中彻底改造现行教育制度的主张，常乃惠也惭愧地检讨自己始终未曾脱离学校生活，是“言不擗行”。他设想将来，“确有了可以信仰的主义，自然不会再在现行教育制度下讨生活了”^③。

常乃惠转向“国家主义”与他主张渐进改革的思路分不开。就在转向发生的同时甚至更早，他感到思想界的“浮浅”，甚至尖刻地主张裁学校跟裁兵一样要紧：教育愈普及，文氓就愈多，漂亮话愈漂亮，思想愈巧妙，民族就将愈趋于灭亡。所以，与其译书，不如造铁路；与其办大学，不如修洛黄河。而“中国民族前途惟一之希望是在从血统上改造民族”，如汉回通婚。^④

用陈独秀的话说，常乃惠重视“现象”胜于“理想”。但在二人争论过去后的1920年代初，常乃惠明显地表现出更关注“理想”设计的倾向。直到他加入中国青年党，接受“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想”。^⑤他辩解道：“所谓理想者不是一个最后静止的世界，而是‘当时此地’的最适合最需要的智识”^⑥。

二、加入青年党：救国的步骤与理论

1925年，常乃惠加入中国青年党。这个标榜“国家主义”的党派

① 参见常乃惠：《反动中的思想界》，《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4～16页。

② 参见常乃惠：《常乃德君来信》，《胡适文存（二）》，329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③ 常乃惠：《后序》，《全民教育论发凡》，2～3页。

④ 参见燕生：《论思想》，《莽原》第15期，1925。

⑤ 参见常乃惠：《国家主义与教育界之新生命》，《国家与教育》第1期，1926。

⑥ 常乃惠：《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国家与教育》第11期，1926。

在教育和政治领域积极行动，仿照国、共两党建立各级组织并拉拢军事武装。但常乃惠从投身实际的教育改造很快就转移至舆论领域，通过报刊宣传该党主张。他用联省自治对抗武力统一，用生物史观对抗唯物史观。尽管同样是高举“革命”旗帜，同样是利用“历史法则”，常乃惠的主张更像是借激进手段以行其渐进的改革。

中国青年党的元老余家菊和陈启天都曾经回忆，1925年8月在太原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他们与常乃惠交流了国家主义的观点，并获得他的赞同。^①这一时期常乃惠还接触到中国青年党的另一位灵魂人物——李璜，后者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暗地里扩充青年党组织。入党之后，常乃惠开始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比如1926年初的反俄援侨大会。这年夏天，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就任青年党创办的“爱国中学”校长一职。一年后，他转向文化思想宣传，专心为《醒狮》等刊物撰稿。自1927年中国青年党（时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起，几乎历届大会宣言皆出自常乃惠之手，他很快便被视为青年党的理论家。

入党初期，常乃惠仍然主要关注教育问题。^②随后发表大量政论，批评时局中各党派、人士，尤其是国民党的表现^③，抨击共产党的理论

① 参见余家菊：《怀常燕生》，《常燕生先生遗集（八）·哀挽录》，15～16页；陈启天：《寄园回忆录》，2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尽管余家菊和陈启天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的时间并不比常乃惠早多少，但二人对该党在巴黎成立和在上海立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1925年7月参与发起了标榜“国家主义”的“国家教育协会”。

② 例如1926年发表在《国家与教育》杂志上的十几篇文章。

③ 例如，惠之：《时局将来之推移与吾人之责任——在爱国青年同志会北京分会讲》，《醒狮》第126期；惠之：《吾人所希望于实行清党以后之国民党者》，《醒狮》第134期；惠之：《新时势之创造》，《醒狮》第144～145期；惠之：《时局之隐忧与其解决之道》，《醒狮》第146～147期；平生：《汪精卫辞职与今后之国民党》，《醒狮》第149～150期；惠之：《国民党之统一与分裂》，《醒狮》第151期；平生：《宁汉战幕揭开以后》，《醒狮》第160期；惠之：《吾人对于自由之意见》，《醒狮》第161期；惠之：《杨杏佛与东南大学》，《醒狮》第162期；平生：《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醒狮》第164期；惠之：《为上海学生总会南京学生的纠葛告宁沪青年》，《醒狮》第164期；惠之：《国民党之所以自贻于国民者》，《醒狮》第165期；平生：《云南护国纪念日我们的感想》，《醒狮》第168期；惠之：《反抗骄奢淫佚的国民党党治》，《醒狮》第171期；惠之：《国民党人之新生命》，《醒狮》第172～173期；平生：《国民党不配压迫共产党》，《醒狮》第172～173期；惠之：《我们对于国民党第四次全体执监会议的总批评》，《醒狮》第174期；凡民：《新革命党产生中之两个歧路》，《醒狮》第174期；凡民：《怎样制止共产党势力之复活》，《醒狮》第176期；惠之：《所谓“第三党”的运动》，《醒狮》第181期；惠之：《奉安与帝制》，《醒狮》第201期；惠之：《编遣问题与国民党今后的生死关头》，《醒狮》第202期；惠之：《项城局面之再演》，《醒狮》第226～233期；惠之：《论国民党之大借款》，《醒狮》第226～233期。

和政策^①，分析苏俄、日本等国对华政策。^②他认为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势力，但内部被共产党挟制（清党以后是影响），同时遗留着旧军阀的特点。他似乎曾有“挽救”、“团结”国民党的企图，密切关注其内部变化，说服国民党与国家主义者合作。但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屠杀手段、不民主治理、腐化堕落等等表现引起他日益强烈的不满。

常乃惠曾提出八点国家主义与非国家主义的区别，关键之处，就是要根据民治的原则、依靠全民的努力、采用革命的手段建成新国家。^③他认为青年党同仁提出的“联省自治”是一个有效办法，因为中国人有省界观念，“以地方的感情，团结民众，以当地的苦痛，激动感情”，自然全体民众都会加入革命，不需要更多的宣传，例如河南的红枪会。^④在他看来，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努力都失败了，或将要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视中国人的地方观念。在很大的区域里实行革命，民意无法团结也无法表现，没有监督革命的力量，从而使革命变成单纯的军事行动，即武力统一，结果造成割据势力和无穷的国内战争。青年党要发动人民自己行动，对于“有觉悟的军阀”，同意其跟随；对于“无觉悟的军阀”，要让他“倒在我们的前面”。^⑤

具体的步骤是：首先鼓吹联省自治，使其成为政治上的“中心思想”^⑥，同时组织信仰这一政策的有力政党。^⑦其次是对抗共产党及军阀。在他看来，理想的自治省将为民众谋利益、保障思想言论等自由，表现民意，而且能在政治经济上有所建设。^⑧对此，常乃惠提出“联省自治，联县自卫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现，需以

① 例如，惠之：《共产党的末路穷途》，《醒狮》第163期；惠之：《勇敢的广东人何不起来实行人民自卫权》，《醒狮》第169期。

② 例如，平生：《满蒙问题与吾人之抵抗力》，《醒狮》第148期；惠之：《对俄绝交后国人应注意的几种隐忧》，《醒狮》第168期；惠之：《朝鲜惨杀我国侨民的因果》，《醒狮》第169期；《野战抗日》，《常燕生先生遗集（五）·政论与时评》，1~7页；《中国的解放与对日根本方针》，《常燕生先生遗集（五）·政论与时评》，8~18页。

③ 参见常燕生：《国家主义与非国家主义之区别安在？》，《新国家》1卷第2号，1927。

④ 参见常燕生：《联省自治与中国革命的新战略》，《醒狮》第152~157期，1927。

⑤ 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醒狮》第162期，1927。

⑥ 曾琦提出，为青年党人所通用。

⑦ 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续一，《醒狮》第165期，1927。

⑧ 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怎样建设自治省》，《醒狮》第166期，1927。